

書評：정민，〈18세기 한중 지식인의 문예 공화국——하버드 옌칭도서관에서 만난 후지쓰카 컬렉션〉（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在哈佛燕京圖書館邂逅之藤塚鄰舊藏〉）

과주（坡州）：문학동네（文學部落），2014，720頁

李菊華*

一、前言

燕行錄，自上世紀六〇年代經中韓學界整理彙編成書之後，¹已成為學界討論中韓兩國交流史不可或缺的歷史資料。其研究領域之多元，涵蓋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d01121007@ntu.edu.tw。

¹ 韓國學界自20世紀60年代就已對燕行錄的整理投入了不少心力。在韓國最早整理燕行錄者為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該院彙編31種燕行文獻將其出版為《燕行錄選集》（上、下）（首爾：大東文化研究院，1960），後又補入諸種文獻出版《燕行錄選集·補遺》（3冊）（首爾：成均館大學出版部，2008）。再者，在韓國燕行錄文獻發掘與整理上，為學界熟知的韓國東國大學名譽教授林基中教授，則將收集到的398種燕行文獻，彙編出版為《燕行錄全集》（100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至今已經六次增補，於2016年9月出版《燕行錄叢刊增補版》，共收562種燕行錄，時代橫跨13-19世紀，該叢刊現已全部數位化，公開於KRpia「한국학 지식콘텐츠 플랫폼」（www.krpia.co.kr），提供燕行錄研究者線上搜尋與閱讀。林基中教授並指出「現今調查到的燕行錄共618種」，「六次增補版已收錄562種，剩餘諸種將於第七次增補時補入」，可見將來燕行錄資料庫文獻將更周密且龐大。林教授除了收集韓國所存燕行錄文獻之外，又曾與日本京都大學夫馬進教授合作出版《燕行錄全集日本所藏編》（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除以上數種燕行錄彙編資料之外，韓國中央研究院則於近期整理18世紀燕行錄中書籍與書畫相關資料彙編出版為《18세기 연행록 기사집성：서적·서화편》（18世紀燕行錄記事集成：書籍、書畫篇）（성남：한국학중앙연구원출판부，2014）。臺灣學界在燕行錄的整理方面起步也比較早，如出版明代36種《朝天錄：明代中韓關係史料選輯》（4冊）（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即為其成果之一。大陸地區的資料整理較晚，有弘華文主編，

明、清兩代與朝鮮外交關係的研究，朝貢貿易體系與東亞經濟史的發展研究，以及兩國知識份子交流史與東亞思想觀念變遷之研究等各種領域。²二十世紀六〇年代之後，中韓學界在中韓兩國歷史、社會、文化交流研究累積的豐碩成果，既為燕行錄奠定了其作為史料的新價值，也為往後歷史研究開闢了另一道以「燕行錄」為考察中國史的研究路徑。就燕行錄作為中國史的研究方法而言，二十世紀後半隨著中國對燕行錄的關注，針對這批十四至十九世紀在朝貢體制下，進入中原的燕行使節留下的第一手遊歷資料的研究，其重點更聚焦在從「周邊」觀看「中國」的角度。就與本文相關的「明清鼎革時期」來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之後大陸地區研究主題包含以下：（一）《燕行錄》史料價值與介紹。³（二）則是在明清鼎革之

《燕行錄全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2010年和2012年分兩輯出版，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與韓國成均館大學則共同合作出版《韓國韓文燕行文獻選編》（30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²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臺灣、韓國與日本的歷史學界，將燕行錄作為歷史史料進行的相關研究也相當豐富。而臺、日、韓早期的研究多半著重在中韓兩國「關係」之研究。亦即就本文所舉外交關係來說，其中包含明清時期的冊封—朝貢體制的多重觀察視角，如西嶋定生與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先生將「冊封—朝貢體制」視為早期東亞秩序的研究；臺灣學者葉泉宏先生則從朝鮮的事大外交政策與宗藩關係分別考察了其與明、清的關係；韓國學者全海宗先生與崔紹子先生，則著重在朝貢制度的考究，及其在明清兩代的變化與影響，進而延伸討論朝鮮與明清關係，清朝與東亞秩序的變化；日本學者夫馬進先生，則將「禮」視為明清與東亞的外交樞紐，考察了中國與東亞的外交交流史。除此之外，在朝貢體系下發展出的貿易體系，以及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史，也是此一時期中國與東亞關係研究的重要課題，如臺灣學者張存武先生根據清朝崇德二年至光緒二十年間的史料，分析來往北京與遼東地區的使節，在出入燕京過程中形成的使行貿易。韓國學者李弘斗先生與李哲成先生則針對明清時期走私貿易進行的實態調查，也是研究中韓兩國朝貢關係的另一種側面觀察。要之，二十世紀中葉到二十一世紀初期，臺灣、韓國與日本學界的研究，多半以朝貢體系為關係史研究的大前提，探討了中韓兩國政經外交關係，以及於此體系下諸類關係之演變。自1960至2008年之間，臺、日、韓三地有關《燕行錄》與中韓關係研究論著，請詳見裴英姬，〈《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43（2009），頁219-255。

³ 如陳尚勝，〈明清時代的朝鮮使節與中國記聞——兼論《朝天錄》和《燕行錄》的資料價值〉，《海交史研究》，2001：2，頁38-55；王政堯、赫曉琳，〈簡論《燕行錄》與清代中朝文化交流〉，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第七輯（北京大學百年華誕暨明知大學五十周年專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20-327；王政堯，〈燕行錄：17-19世紀中朝關係史的重要文獻〉，收入耿昇、朴燦奎、李宗勛、孫泓主編，《中外關係史論叢第12

後，反應在使節眼中的中國，其中包含政治、文學與社會文化等研究。⁴

（三）為討論燕行使對明清兩朝的文化認同。⁵除了上列重點主題之外，近來在歷史地理問題、東北史研究以及東北氣候、民族、風俗的研究上，也有嶄新的開展，可見近二十年來大陸地區燕行錄研究主題之多元，成果益顯豐碩。⁶不過，在過去二十多年，燕行錄被提升為研究方法與研究材料的同時，也逼顯出明清鼎革時期的「東亞」是否可以視為「共同體」的思考，以及朝貢體系下的「東亞」如何成為整體的提問。就「東亞共同體」論述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包含從當代燕行使節的視角論述共同

輯：多元視野中的中外關係史研究——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第六屆會員代表大會論文集》（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7），頁581-585。

⁴ 側重於政治方面研究有張雙志，〈18世紀朝鮮學者對清代西藏的觀察——讀朴趾源《熱河日記》〉，《中國藏學》，2007：3，頁33-39；韓東洙，〈18世紀朝鮮燕行使與北京紫禁城——以儀禮空間之分析為中心〉，《紫禁城》，2011：3，頁12-25。文學方面則有金炳珉，〈《韓客巾衍集》與清代文人李調元、潘庭筠的文學批評〉，《外國文學》，2006：6，頁67-72；〈朝鮮詩人朴齊家與清代文壇〉，《社會科學戰線》，2002：6，頁100-104；朴香蘭，〈燕行錄所載筆談的文學形式——以洪大容與朴趾源為中心〉，《世界文學評論》，2011：2，頁221-229。社會文化方面則有朴現圭，〈朝鮮使臣與北京琉璃廠〉，《文獻》，2003：1，頁269-285；黃美子、禹尚烈，〈朝鮮燕行使與中國琉璃廠〉，《東疆學刊》，2004：2，頁10-13；楊雨蕾，〈朝鮮燕行錄所記的北京琉璃廠〉，《中國典籍與文化》，2006：4，頁55-63；王振忠，〈朝鮮柳得恭筆下清乾嘉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抄本《冷齋詩集》為中心〉，《中華文史論叢》，2008：2，頁133-177。

⁵ 代表著作有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楊雨蕾，《燕行與中朝文化關係》（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臺灣近期在此項研究上亦有值得關注的成果，如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2015）即為一例。

⁶ 綜觀上列諸項研究，多半側重在「周邊」觀看「中國」的角度，尤其關注在朝鮮使節所見所聞之清帝國，以便透過燕行使節的紀錄，補訂史實，補正正史記載之不足，或藉以作為了解中國部分區域（如東北、承德、通州、登州、義州、北京琉璃廠等）歷史與文化的鑰匙。而本文將介紹的《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一書，則是從「韓國」內部的視角出發，重點在於說明18世紀朝鮮內部無奈的現實環境與意識形態的轉折，以及藉著新出土資料的脈絡化，重塑18世紀中韓文人如何以文藝交流建構共和國的過程，以及這樣的文藝交流在朝鮮文藝史上產生的效應。鄭珉先生的研究雖然也以燕行使節為其敘述重點，但就觀看角度與敘述目的來說，與從「周邊」看「中國」的燕行錄研究形成鮮明的對照。關於大陸地區近二十年《燕行錄》相關研究，請詳見王禹浪、程功、劉加明，〈近二十年中國《燕行錄》研究綜述〉，《哈爾濱學院學報》，33：11（2012），頁1-12。

體的形成與崩解歷程，亦包含東亞儒者如何透過經典詮釋與閱讀進入共同體的脈絡，與以近代的「尊朱論」與「脫朱論」為焦點，討論「東亞」如何在十七世紀以後才出現類似「共同體」的概念，以及以「漢字」作為收編漢文典籍的類目，塑造一個以漢字為中心的「漢字文化圈」。⁷然而，作為「方法」與「材料」，作為「共同體」或「文化圈」的佐證史料，燕行使節的「經驗」有意無意間，既成了「在場」的歷史見證，同時也成為歷史敘述中「不在場」的皺褶。

在近二十多年來燕行錄研究的大趨勢下，《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見藤塚隣收藏》（以下簡稱《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⁸的出版，也許正向當前的燕行錄研究提出疑問，是否可據實際的筆談史料來復原中韓文人交流的實際境況，而不是以使節的經驗來後設的佐證歷史事實？又是否可據中韓文人個人的著作與創作，重塑燕行錄中，因著文藝的來往所交織出的人文風景？作者鄭珉教授認為，遮蔽於皺褶裡的使節聲情，也許正隱藏於文藝作品的重編與刪削之間，異本的出土與對照，抹消與增衍的字詞與語彙，也正體現著中韓文人如實的文化交流處境與話語交鋒的焦點。燕行錄作為近世東亞歷史的大敘述，我們無法否認它在史學上的資料價值，但另一方面，我們亦無法忽略在以朝貢為東亞秩序的近世，使節如何以個人的紀錄與記憶，重述這一段由明入清、由古典邁

⁷ 請詳參以下諸書：葛兆光先生，《宅茲中國——重建有關歷史的論述》（臺北：聯經，2011）；宮嶋博史，〈儒教的近代としての東アジア「近世」〉，收入和田春樹、後藤乾一、木畑洋一、山室信一、趙景達、中野聡、川島真編，《岩波講座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1卷——東アジア世界の近代——19世紀》（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53-78；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清華學報》，新33：2（漢學與東亞論專號）（2003），頁455-468；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除此之外，關於共同體的瓦解，參見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1，頁29-58；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學月刊》，2005：10，頁41-48；寧博爾，〈明清易代後朝鮮人「遺民」情懷探究——以《熱河日記》為中心〉，《鄭州大學學報》，2008：5，頁106-112。

⁸ 自2013年3月至12月，鄭教授在哈佛期間接受韓國「文學部落」邀稿，每週於「文學部落」Naver Café即時連載在燕京研究所之所獲所得，連載次數共40次，故亦屬韓國「文學部落」出版「我們時代的名講」系列叢書之一（第六集）。本書出版同時，亦被燕京圖書館列為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 No. 12。

向近代、由東亞轉向西方的動態歷程。就此而言，《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在書寫策略上，乃是一部藉著個體記憶追述東亞群體歷史的著作，在方法上，則是一部將古典的考證學引入近代文藝書寫的人文學讀物。它是歷史的敘述，也是抒情的小品，藉著詩、書、畫的引證，編織的是十八世紀東亞文人從古典進入近世的人文光譜，也足以對當前燕行錄的研究熱潮提出另一種脈絡與聲音。

二、作者鄭珉教授簡介 與寓學術於隨筆中的創作風格

鄭珉教授現任韓國漢陽大學國語國文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鄭教授自博士論文〈朝鮮後期古文論研究〉⁹的撰寫開始，至今在韓國漢文學研究上經過長期的耕耘，不僅累積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並在漢文獻新資料的發掘、介紹與復原上樹立了非凡的貢獻。鄭教授近期的著作，尤其聚焦在漢文古典文本的脈絡化，以及韓國古典漢文學的現代式詮釋，與明清文學的交涉研究。作者最主要的代表作，首先包含針對朝鮮個別漢學家的研究，如解讀朴趾源散文的著作《似皆非真》、《古典散文論與燕巖朴趾源》，以及茶山丁若鏞建構的新知識範式（paradigm）之考掘《茶山先生知識經營法》，與茶山人生的探索《茶山的再發現》、《改變人生的際遇》；再者，針對十八世紀文人的相關研究論著，則有《18 世紀知識人的發現》與《痴即狂》等。除此之外，鄭教授亦有古典漢文學的現代韓語翻譯與創作，如清言小品隨筆集《李德懋的漢書被褥與論語屏風》、《茶山語錄清賞》、《成大中處世語錄》等；《漢詩中的鳥、繪畫中的鳥》則是一部研究朝鮮後期漢詩與繪畫中鳥類書寫的著作；《重寫朝鮮的茶文化》則是探析茶類與品茶文化之作。此外，亦有多部漢詩相關專門書籍與兒童讀物。¹⁰

⁹ 鄭珉，〈朝鮮後期古文論研究〉（首爾：漢陽大學國語國文學系博士學位論文，1989）。

¹⁰ 漢詩研究相關著作，有探索漢詩中神仙世界的《超越的想像》，與分析漢詩詩美感的《漢詩美學散策》，以及兒童漢詩入門讀物《鄭珉先生訴說的漢詩故事》，與歸結漢詩中四季詩情的《花朵的微笑》等。

本文介紹的《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則是鄭教授於 2012 年受哈佛燕京研究所之邀，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期間，根據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庫的館藏完成的最新力作。¹¹

鄭教授向來對朝鮮後期漢文學的研究與普及，以及新資料的探索，堅持著一貫的熱心與關注。這一方面體現在鄭教授對漢文學古籍的挖掘，另一方面則顯露在書寫筆法的普及化與日常化。《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亦在研究方法與書寫方式上呈現著作者獨特的風格。誠如上述，本書是鄭教授在哈佛為期一年的研究期間，根據燕京圖書館的館藏書寫成的產物。因此書中包含多部新發掘的史料的介紹、版本資訊與版本比對等考訂工作。一般而言，版本書誌與版本考訂的撰寫，往往因其制式的內容所限，易變得枯燥乏味。但鄭教授在這部著作中，卻採取日記式的書寫策略與學術隨筆的筆調，將新資料的書誌資訊穿插在鄭教授發現善本書的過程，以及其發現當下的心境，乃至於在哈佛燕京圖書館中的生活經驗，使得讀者能夠跟隨其敘事與體會，從日常事件中邂逅善本書籍，進而以書籍的紙張，藏書印與書籍中的筆記等周邊資訊作為線索，鉤稽相關的歷史，幫助讀者理解古籍成書的背景、書籍成書後迭經多手、流轉各方的過程，以及不為人知的收藏野談。例如作者在第 1 話訴說自己在燕京圖書館未曾預

¹¹ 鄭珉教授著作如下：《비슷한 것은 가짜다》（似皆非真）（서울：대학사，2000）；《고전문장론과 연암 박지원》（古典散文論與燕巖朴趾源）（과주：대학사，2010）；《다산선생 지식 경영법》（茶山先生知識經營法）（과주：김영사，2006）；《다산의 재발견》（茶山的再發現）（서울：휴머니스트，2011）；《삶을 바꾼 만남》（改變人生的際遇）（과주：문학동네，2011）；《18세기 조선 지식인의 발견》（18世紀知識人的發現）（서울：휴머니스트，2007）；《미쳐야 미친다》（痴即狂）（서울：푸른역사，2004）；《한서 이불과 논어 병풍》（李德懋的漢書被褥與論語屏風）（서울：열림원，2000）；《다산어록청상》（茶山語錄淸賞）（서울：푸르메，2008）；《성대중 처세어록》（成大中處世語錄）（서울：푸르메，2009）；《한시 속의 새, 그림 속의 새》（漢詩中的鳥、繪畫中的鳥）（서울：효형출판，2003）；《새로 쓰는 조선의 차 문화》（重寫朝鮮的茶文化）（과주：김영사，2011）；《초월의 상상》（超越的想像）（서울：휴머니스트，2002）；《한시 미학산책》（漢詩美學散策）（서울：휴머니스트，2010）；《정민 선생님이 들려주는 한시 이야기》（鄭珉先生訴說的漢詩故事）（서울：보림，2003）；《꽃들의 웃음판》（花朵的微笑）（과주：사계절출판사，2005）。

期的發現藤塚鄰舊藏的《鐵橋全集》與《浙江鄉試硃卷》時，筆鋒的焦點並未完全著眼在書籍版本學或文獻史上的價值，而是圍繞藏書人個人趣味與藏書經過的相關故事，訴說書籍抄錄時所用的特殊紙箋，該紙箋的特殊名稱，以及抄錄時運用的書體和書籍的裝潢等特色，足以作為一部東亞漢籍的導引手冊。又如，第9話中，作者將分藏在燕京圖書館善本書庫，與一般書庫中的藤塚鄰舊藏齊聚一堂後，以擬人化的手法，描寫書籍互道平安的過程，形容書籍再聚時的喜悅場景，似乎讓讀者感受到，古籍不單是沒有情感的玩物，它還是在前近代漢文學與學術史上擁有眾多歷史故事的活物。如何讓書籍的故事活現於當下，又如何為書籍訴說其流轉的身世與歷史，鄭教授用他獨特的散文體筆法，告訴讀者閱讀古籍的方法，它就在我們對藏書人整體生命脈絡的理解中，也在嗜書人玩味書籍的日常生活裡，亦在我們循線追索，串起眾多故事的點滴之中。如同同樣在古籍研究界引起關注的沈津、韋力等人的作品，在看似非學術性的格式之中，蘊藏許多寶貴的學術意見，這是閱讀鄭珉教授著作時所當具有的前備知識。

三、「偶然」中的新大陸 ——鄭珉教授與藤塚鄰舊藏的邂逅歷程

書寫有時需要作者堅定的意志，有時也需要依憑未曾預料的偶然，關注一個課題的同時，跟隨著資料本身，往往也會帶領書寫者進入另一個未曾預料的境遇。鄭教授與日本漢學家藤塚鄰舊藏的邂逅，也正始於「偶然」的機緣。鄭教授抵達波士頓前兩個月期間，一則由於語言上的障礙，一則由於尚未適應環境，輾轉未能開始進行善本書庫的調查與啟程前所預計的研究工作。困頓之餘，一日在書房回想過去參觀韓國果川博物館「秋史書畫歸鄉展」（2006）時的體會，一面翻閱洪大容的《乾淨衎筆談》，突然好奇燕京圖書館是否收藏洪大容入燕時所見中國人文的文集，不料在燕京圖書館以嚴誠為關鍵字，搜尋到了兩種相關書籍。其一為嚴誠的文集《鐵橋全集》，另一則是由朝鮮文人收集嚴誠、陸飛、潘庭筠三人試卷編輯成的《浙江鄉試硃卷》。次日經作者在燕京圖書館善本室的調閱與翻

查，並經書籍裝潢與筆記方式的比對，以及特殊用箋與題簽等的確認，驚覺這兩種抄本，竟是傳說中失散各地的藤塚鄰舊藏，也由此展開了一個不曾預料，但收穫更豐富的研究課題。如此「偶然」的機緣中，鄭教授開始展開燕京圖書館藤塚鄰舊藏的發掘與梳理，並聚焦於藤塚鄰著作中之不足，開始撰寫《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

為便理解《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的骨幹，不得不先了解日本漢學家藤塚鄰（1879-1948）其人，以及其舊藏的學術價值。1926年日人於韓國設立京城帝國大學初期，藤塚鄰由服部宇之吉（1867-1939）¹²推薦至京城大學擔任中國哲學部教師。直到1940年卸任為止，藤塚鄰在朝鮮共停留15年。二十世紀初日本學界普遍熱衷於中國漢學的研究，藤塚鄰卻是一位罕見的朝鮮漢學的研究者，同時也是一位罕見的收集朝鮮時期古籍與書畫的收藏家。據藤塚鄰之子藤塚明直（1912-2006）記述，藤塚鄰與朝鮮漢學的機緣，始於他在北京短暫居住的兩年停留期間（1921-1923），兩年間，他來回於琉璃廠的書肆中，蒐集中國的古董書畫與書籍，是藤塚鄰在北京最樂此不疲的日常。然而，這位原本研究清代考據學與經學的研究者，卻因為在偶然的機會搜得由陳鱣（1753-1817）編撰的《簡莊文鈔》，並在其中發現陳鱣為楚亭朴齊家（1750-1805）所作之〈貞蕤稟略序〉，¹³於是開始進入清朝文化東傳的研究。最終藤塚鄰成為朝鮮考據學家秋史金正喜（1786-1856）的研究專家。據藤塚明直追述云：

父親從此時開始就認為朝鮮是進入清代學術的「宇宙停靠站」，進而計畫在朝鮮發掘翰墨、畫幅、善本，並進一步重製、再編這些難得的古文獻。……（父親認為）實際上有價值的東西都沈睡在高麗的平原深處，精良的石油大多蘊藏在太古腐蝕的有機底層。……¹⁴

¹²日人於1926年在韓國設立京城帝國大學時，服部宇之吉為第一任總長。關於藤塚鄰與服部宇之吉之間的學術淵源，以及服部宇之吉在日本漢學界的學術地位等，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8話：所有的偶然都是必然——服部宇之吉與京城帝國大學〉，頁128-147。

¹³朴齊家與清代文人之交遊關係，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29-36話。

¹⁴轉引自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7話：朝鮮無學問——藤塚鄰的資料收集〉，頁119。

當日本學界普遍認為朝鮮漢學只是宋明之學的餘沫時，¹⁵這位罕見的朝鮮漢文學者卻在平原的底層，在太古的有機層裡，發現了朝鮮漢文學是進入清朝文化東傳史研究的「宇宙停靠站」，並指出朝鮮是蘊藏東亞文化交流史資料的「中介點」。這是極為重要的學術觀察。往後藤塚鄰不隨時代潮流，決定長期專研當時少有人關注的朝鮮漢文籍，且蒐集清、朝交流藝文史料，最終的成果展現在他的博士論文《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¹⁶（以下簡稱《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裡，而書中所錄其用以佐證史實之資料，及附錄所列搜尋到的古籍與往來書信、書畫等，更是令人對這位考據學家的收集功力畏然起敬。然而因為二十世紀上半葉戰亂與資料的散失，使得藤塚鄰的貢獻，未能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鄭教授的偶然發現，其實是將這個學術史上的斷裂，重新接回近代的脈絡，在近代東亞的研究史上，這是值得重視的成果。

除此之外，鄭教授指出「藤塚鄰在 1940 年卸下京城大學的教職回國時，運回日本的藏書幾乎超過四個火車貨櫃。1921-1923 年他在北京停留期間，遍訪琉璃廠搜獲的原刊本書籍則近一萬卷。如果再加此前收藏的書籍，在北京就蒐集了將近三萬餘卷的書籍。停留朝鮮期間，藤塚鄰收集的朴齊家與秋史金正喜等朝鮮文人文集與書畫筆墨，以及與清代文人來往的親筆書信，也多達一千餘件。現今指定為國寶的秋史的〈歲寒圖〉也就是這些朝鮮收藏品之一」（頁 16-17）。不過，這些在二十世紀初由藤塚鄰費盡苦心收集到的原刊本書籍與中韓兩地文人的遺墨，卻歷盡戰火的折騰以及戰後經濟的窘迫，最後未能倖免於離散的命運。其中，秋史金正喜的〈歲寒圖〉，雖然有幸於二十世紀初歸還回韓國。¹⁷但除〈歲寒圖〉之外，在藤塚鄰擔任大東文化大學總長時，存放於該校收藏室的部分書籍，卻因戰爭

¹⁵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国書刊行会，1975），〈導言〉，頁4。

¹⁶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導言〉，頁4。

¹⁷戰火頻仍期間，孫在馨至日拜見藤塚鄰，在藤塚鄰住宅附近停留長達九十天，不斷與藤塚鄰交涉協議〈歲寒圖〉購買事宜，最終藤塚鄰為其感動，同意無償寄贈。〈歲寒圖〉歸還一事，與〈歲寒圖〉歸還後輾轉的遭遇，以及最終流入果川博物館的經過與餘話。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27話〉，頁650-665。

末期（1945年3月10日）美軍轟炸東京的炮火，全數付之一炬。另一部分存放在藤塚鄰住家防空洞中的古籍與遺墨，則在藤塚鄰過世之後，藤塚明直為了解決經濟上的窘迫，只得販售於市面上。其他未經販售的一萬四千餘件舊藏，則在2006年藤塚明直過世之前，全數無償的贈送給秋史的故鄉韓國果川市果川文化院。¹⁸而鄭教授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發掘到的藤塚鄰舊藏，也就是在藤塚鄰過世後，由後代售於市面上的部分收藏品。¹⁹它就像藤塚鄰在二十世紀初，偶然發現於琉璃廠的那些朝鮮古籍與書翰筆墨一樣，也是失而復得，重現天壤。通過消失文物與資料的發現，足以使人找到學術史上消失的拼圖，進而補綴起過往遺失的學術圖像。而這些塵封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近六十年的藤塚鄰舊藏，也偶然被鄭教授召喚至二十一世紀初的朝鮮漢學界，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過去所未知的脈絡與視角。

四、「文藝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 ——漢學知性交流史上的關鍵詞

上世紀由藤塚鄰親身尋訪古書店蒐集到的書籍，其中與金正喜相關的文件已被藤塚鄰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運用發揮的淋漓盡致。但嘉慶與道光之前，18世紀中韓文人之間的每一個照面與相逢，卻未能在藤塚鄰此部著作中得到充分的闡釋。然而，這些隨世變與局勢流動，致使遺落在陳年書庫角落裡的記憶，仍然能通過書籍的留存，再次重現世人眼前。經鄭教授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搜尋，這些材料終究變成他追蹤與補證藤塚鄰著作所闕如的線索。藤塚鄰遺留在書籍裡的硃圈與筆記，也成為鄭教授編織前一世紀中東亞「文藝共和國」的線索。

自鄭教授未曾預期的發現燕京圖書館藤塚鄰舊藏之後，按照藤塚鄰紀錄所指引的方向，藉著舊藏中東亞文人互換的訊息，勾勒18世紀中韓知識

¹⁸藤塚明直過世前，決定將父親的收藏贈予果川文化院的經過，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27話〉，頁650-665。

¹⁹二十世紀初，燕京圖書館收購古籍的經過，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38話：散落的遺珠——裘開明檔案閱覽記與藤塚鄰舊藏書目錄〉，頁666-683。

人所建構的「文藝共和國」，儼然成為鄭教授留美期間最主要的課題。然而，閱讀鄭教授著作可知，18世紀東亞文藝共和國的想像圖式，當有賴東亞文人以共通的語言——「漢文」為其溝通與交流的基礎。以「漢文」作為東亞研究基礎的命題，雖然早在張伯偉教授的《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一書中就已提出，但同為「漢文」構成的「文化圈」與「共和國」，卻在研究面向與基本旨趣上顯現著不同。首先，根據張教授的研究，「漢文化圈」預設的是將漢字材料作為一個整體，其中囊括「朝鮮、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的河西走廊地區東部諸地域」的漢文典籍，而將漢字材料作為研究「東亞世界」²⁰的方法，是為了超越國別和地區，將「漢文化」和「漢籍」視為一綜整之主體。²¹但鄭教授以「漢文」為「文藝共和國」的觀念框架，則更強調藉著漢文學與藝術之交流所構成的知識網路。亦即，鄭教授所欲勾勒和討論的，是建立在漢文書信與筆談間的因緣，如何成為牽引同一文學集團與清朝文人結識、交流的網路；書信與筆談的匯集與重編、閱讀與評騭、流傳與普及，又如何成為未曾謀面的中韓文人，提供一個交流的中介，形成進入知識交流網路的憑藉。因此，就張教授與鄭教授的研究目的來說，前者在於「为了更好的認識漢文化，更好地解釋

²⁰ 日本學者西嶋定生於〈東亞世界的形成〉中指出：「『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為基軸而形成的。……隨著中國文明的開發，其影響進而到達周邊諸民族，在這裡形成以中國文明為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這就是『東亞世界』。……這樣的『東亞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包括其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的河西走廊地區東部諸地域。」西嶋氏「東亞世界」之說，引自張伯偉，《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北京：中華書局，2011），〈導言〉，頁5。中譯版收入劉俊文主編，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專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88-103（見頁88-92）。

²¹ 張伯偉教授借用日本學者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說，以及構成這個文化圈的諸要素，與法國學者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提出的「漢文化圈」，指出：「西嶋氏所說的『東亞世界』，大致即本文所指漢文化圈。作為其本質的特徵，列為第一的就是『漢字文化』」。亦即以「中國文明為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這就是『東亞世界』」，也就是張教授所說「漢文化圈」。而以這一區域的共同文化根源——漢字所構成的漢籍就是漢文化圈的載體。然而，張教授研究目的乃在跨區域彙整所有以漢字書寫的漢籍，以便「作為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而其最終關懷則在「更好地認識漢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東亞文明對人類的貢獻。」參見氏著，《作為方法的文化圈》，〈導言〉，頁1-10。

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東亞文明對人類的貢獻」，也就是發掘東亞世界中的「漢文化」，以及其在東亞文明上的貢獻；而後者則在於發掘促使 18 世紀中韓文人超越相識與不相識、凝聚與疏通的共享資源（漢文藝），以及參與 18 世紀文化場域的流傳者與評騭者。

其實，以共通的語言為溝通基礎，以書信與書籍的往來形成網絡，進而建構想像的「文藝共和國」的觀念，早見於 17 世紀後半至 18 世紀的歐洲。作者在前言中，不忘指出「文藝共和國」一詞的來源與內涵，²²並也指出之所以對「文藝共和國」一詞產生莫大魅力，乃是由於閱讀日本漢學研究者高橋博已教授《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蒹葭堂——》²³一書的啟發。不過，即便鄭教授與高橋教授都以漢文作為東亞文人溝通的共同基礎，來想像 18 世紀東亞的「文藝共和國」，但二位教授的焦點、論證方式與研究對象，仍然可見明顯的差異。²⁴首先，高橋博已教授的著作，試圖勾勒的是 18 世紀朝鮮通信使與日本文人集團之間的交流情景，以及 18 世紀初期由成大中（1732-1809）、南玉（1722-1770）、元重舉（1719-1790）與木村蒹葭堂（1736-1802）等人，如何以漢文為中心建立文藝網絡，以及蒹葭堂一派之漢文成就，如何藉著朝鮮後期北學派譯介到朝鮮文壇。而書中所引資料多為現傳文集資料，絕少引述新出土文件與檔案。相較而言，鄭教授著作的著眼點，乃在以新出土的漢文文獻資料（包含韓國近來出土的漢文文集），實證性的考察 18 世紀中韓雙方文人疏通與交流的網絡。並從異本的比對，來推敲中、韓乃至於朝鮮內部文人之間閱讀與視角的差異。²⁵

²²「文藝共和國」一詞，出現於 17 世紀後半至 18 世紀的歐洲學界，意指人文學者超過國家與語言的界線，以拉丁語作為共同的語言，相互來往書信、交換書籍，因此形成的知識網絡，以及想像的共和國。參見鄭珉，《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前言〉，頁 5。

²³高橋博已，《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通信使・北学派・蒹葭堂——》（東京：新典社，2009）。

²⁴高橋博已教授現任日本金城學院大學教授，《東アジアの文芸共和国》一書援引「文藝共和國」一詞，乃在辨析 18 世紀非漢族的日、韓兩國文人，如何得以以漢文為共同語言相互溝通、交流，進而討論文藝與學術上的問題。鄭珉教授與高橋博已教授，多年前就共同參與「世界 18 世紀學會」的研究活動。

²⁵如李調元《續函海》中所錄李德懋《清脾錄》與現傳《青莊館全書》所收《清脾錄》的原文頗有出入。張伯偉教授既指出：「這些差異，並非僅僅是常見的書籍在刊刻傳寫過程中的訛誤，同時也因為刊刻者、抄寫者以及閱讀者有意識的更改

再者，循著入燕使節的燕行時期，循序勾勒清朝文化與學術傳入朝鮮的時間軸，並以此時間軸階段性的追蹤中韓文人的學術因緣如何延續到 19 世紀，以至於在朝鮮後期出現一位考據學集大成者金正喜的脈絡，也是鄭教授有別於高橋博巳教授的另一點特色。

誠如鄭教授所說「文化是一條線」²⁶，每一件實證性的漢文文獻都是本書建構文化場域的點，每一條由點聚集成成的線，皆指引著一定的方向。當不同的線由兩端湧進交集出火花時，文化的場域與焉成形。在文化的場域裡發光、發熱的火花，即是使文化空間成為立體的動力。鄭教授自言循著文化的點尋繹「文藝共和國」的輪廓，也就是這部著作最素樸的夢想。

或強調，不同的更改者或強調者還有各自的動機，這些更改、強調背後的意識和動機值得我們詳加探討。《清脾錄》在東亞三國之間流傳，同時也被三國文人閱讀。繞有意味的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三種不同的讀法。李調元從《清脾錄》中讀出了虛榮，也從書中受到了刺激，從而影響了《雨村詩話》的寫作。……朝鮮人則從《清脾錄》中讀出了榮耀。一方面因受到中國文人的高度肯定與關注，另一方面，（因）『東人著述為華士所刻』，更是『曠世希觀』的美談。……」。詳見張伯偉，〈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以《清脾錄》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4：2，頁164-208。關於《續函海》本與《青莊館全書》本《清脾錄》之版本考證，詳見鄭健行，《乾淨術筆談·清脾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韓國詩話探珍錄》（北京：學苑出版社，2013）。朝鮮內部文人之間的視角差異，請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15話：為人所知的幸福〉，「李德懋的蟬橘堂事件」，頁258-265。

²⁶鄭教授原文實有總結的意味，故原文較抽象的敘述著作者對文化的想像。筆者則按作者原文，並結合著作中的特色，邏繹出作者欲實踐於本書中的旨趣。韓文原文翻譯為：「文化是一條線，是同一範圍內的一群人刻印下來的點聚集成成的線。當這條線一齊指向同一個方向時，線才會有一個方向性。從兩個不同方向向前行駛的線，交錯時就會形成交集點。在交集點產生的小火花會形成一個全新的面。朝向前方躍進的線於是擁有一個『場』。無數的點會一齊的湧進這個運動場，聽隨裁判的口哨進行競逐與比賽。這些點噴發出的熱情，這些點併發出的光彩使得平面空間變得立體感。這就是我素樸的想像——文藝共和國之夢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40話：未完的夢，文藝共和國〉，頁714。

五、「並世」——峰迴路轉的時代意識

18 世紀東亞文人共通的語言——「漢文」，點燃建構「文藝共和國」的素樸想像，而 18 世紀東亞文人共同的意識——「並世」，則是維繫東亞文人為一個同心圓的立足點。亦即，如果以「漢文」作為追索東亞「文藝共和國」的一個切入點，這樣的方法實際上亦應適用於 18 世紀以前東亞文人的景況。不過，18 世紀之所以有別於前期，以至於能夠稱之為「文藝共和國」，作者認為除了漢文之外，具有「同時性」的「並世意識」才是區分 18 世紀與前一時期人文活動的分界點。²⁷根據作者所云，「並世意識」是指：

共同生活在同一世界的文人之間形成的連帶意識。從「尚友千古」，即由前世紀以空間為核心的縱向思維，轉變為「天涯知己」，即強調當代與同時代性的時間性思維。這種思維的變化意味著同一時代的文人以水平性的思考方式，超越身份與國界形成連帶的意識。²⁸

換言之，「並世」意識蘊含著一種超越國界與身份位階的開放態度。再者，18 世紀朝鮮「並世」意識的成熟，才是使文人超越身份的樊籬走向互融，亦使文人從侷促的國族意識走向互通的樞軸。²⁹然而，此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人群體，莫過於所謂「燕巖一派」³⁰，而他們對清代文化與文人的

²⁷ 「同時代性才是進入18世界文藝共和國的公民權。」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頁382。

²⁸ 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頁389；정민（鄭珉），〈18, 19세기 조선지식인의 병세의식(并世意識)〉（18、19世紀朝鮮文人的並世意識），《韓國文化》，54（2012），頁183。

²⁹ 「並世意識的成熟，使得阻絕的東亞走向相互開放，亦使得侷限在國守主義的封閉思維轉換為開放。在這種變換的意識基礎上，無數的資訊以至於形成流通，並造就了自國學術文化的變化。」詳見정민（鄭珉），〈18, 19세기 조선지식인의 병세의식(并世意識)〉，頁184。

³⁰ 燕巖一派，亦稱北學派。按劉奉學先生《燕巖一派北學研究》：「北學派，係指朝鮮後期老論之中，一部分提倡『北學論』的文人。正祖時期，他們由於北學的文風傾向，受到正祖的譴責。而在文風事件中浮現的交遊群體，即為『北學派』。其具體成員有朴趾源、朴齊家、李德懋、李書九、南公轍等。……不過，

對應方式，也最能代言此一時期意識的變化。書中所舉「洪大容（1731-1783）與金鍾厚（1721-1780）的一等人論爭」（頁 223-238）之例，說明的正是明亡百年之餘，仍延燒於朝鮮文人之間的「小中華」觀念，如何與新世代的並世意識產生衝撞與壓抑。

洪大容在「燕巖一派」中是第一位踏上燕行之路的文人，也是奠定此後燕巖一派與清人因緣基礎的開路者。1765 年，他以其叔父洪櫓的子弟軍官身份入燕，將其在燕京的所見所聞，及其與當代漢族舉人與西方傳教士的筆談、書信，編輯成《湛軒日記》、《乙丙燕行錄》與《杭傳尺牘》所謂「燕行三部曲」。洪大容的燕行體驗，以及他與嚴誠、陸飛及潘庭筠等相濡以沫的交流景象，因燕行日記的廣泛流行，瞬間成為文人之間的佳話，因此也開啟了燕巖一派文人嚮往北學的序幕。洪大容與金鍾厚的一等人論爭，即發生於洪大容回朝之後，燕行三部曲正當流行期間，交鋒的重點原先設定在：是否可將清人解釋為一等人上，但後來卻由金鍾厚將焦點轉移到春秋大義的大判斷上。然而，洪、金二人論爭過程中的衝撞，正代言著明亡之後，朝鮮內部崇明思想的龜裂，以及經驗清朝文化的文人逐步改觀的他者意識。

明亡之後，立足於朱子名分論興起的「大明義理論」、「北伐大義論」、「小中華意識」，可以說是以朝鮮與「明」在政經、外交上的親疏遠近關係為準的，區分華夷之別的觀念。亦即，所謂「華夷之辨」，即是根據明朝在東亞以朝貢體制劃分的位階，來辨析明、清、朝鮮三者的主體位階之謂。³¹明亡初期，朝鮮不僅是為了為明雪恥復讎，將清朝視為應該討

就他們的學術傾向而言，學問的主調並非完全聚焦於『北學』，因此與其稱為『北學派』，不如稱之為以燕巖為中心的一派，即『燕巖一派』較為適宜。」亦即以燕巖朴趾源為首，注重北學並相互以學問交遊的文人群體，稱之為「燕巖一派」。《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討論的朝鮮文人群體，即與鄭雨峰所指「燕巖一派」重疊，且作者在著作裡常用「燕巖Group」總稱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與朴齊家，故本文援引劉氏「燕巖一派」代指「燕巖Group」。劉氏之文請詳見《燕巖一派北學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緒論〉，頁18。

³¹按劉奉學先生《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整理：「大明義理論」係指明朝淪亡之後，朝鮮仍以君臣之義尊崇明朝的意識（筆者按：如以「重造之恩」指明朝在壬辰倭亂時期派救援朝鮮一事，又如肅宗年間，設大報壇祭享神宗至毅宗之舉，或文人在私撰文書中仍沿用崇禎年號等事。）；「北伐大義論」係指對於中原的新

伐的對象，而且還認為朝鮮才是一個真正用夏變夷漢化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而用武統夏的胡虜——清朝，既無承接中華政統（正統）的資格，亦不是一個被東亞諸國認同的統治者。金鍾厚雖距明亡逾百又十年，但在與洪大容爭論一等人的書信中，仍可見其以北伐看待他者（清），以小中華自居的華夷意識。例如，金鍾厚在洪大容入燕之前所致書信，就苦心勸阻湛軒「欲大此心」與其受苦受辱入「腥穢讐域」開「目之局」，不如先正心脩己擴充「心之局」。³²再如湛軒入燕回朝後，當金鍾厚得知湛軒「入燕時與杭人輩交歡」後，不僅「大加非責」，還將在清朝應舉的杭州文人，視為「奔走求事於胡盧之徒」的第二、三等人。金鍾厚與洪大容的論爭，最終由金鍾厚將問題的焦點，從夷狄可學與不可學，轉移到排闢清人箝脅的「春秋」論斷。³³爭論最後洪大容雖未同意金鍾厚的觀點，但為了避免同志數人枉受「無秉彝之責」，故以和緩的口氣回應，避免了可能造成對峙的肇端。不過，在這則故事裡，不論是用「腥穢讐域」指稱清朝，或是用「胡盧之徒」、「剃頭舉子」稱清代文人，皆反應了金鍾厚自居於中心視清朝為邊陲的中華本位思想。金鍾厚的態度，也正反映著 18 世紀以前，以明為中心劃分位階的東亞秩序，如何固執的殘存到明亡，並執拗的盤居在朝鮮文人思維的現象。

「燕巖一派」的思維正好與此相反，在並世與同時的思維方式下，人際關係的擴張不受名分界線的阻礙，思想與情感的交流不受國族意識的箝制。只要是真情實感的書信，只要是實事求是的筆談，或只要是意氣投合

統治者胡清的反清意識；「小中華意識」係指朝鮮自任為中華文化的唯一繼承者，將中華文化視為朝鮮的主體意識。上述三種意識皆立基於朱子的名分論，它從華夷觀出發，則在國際秩序上形成三重不同位階，但從名分論的角度來看，卻是三位一體，互為表裡的文化意識。詳見劉奉學，《燕巖一派北學思想研究》，頁56-68。

³²〔朝〕金鍾厚，〈答洪德保〉：「足下今日之行，何為也哉？匪有王事而蒙犯風沙萬里之苦，以蹈腥穢之讐域者，豈非以目之局而思欲豁而大之耶？目之局也則思大之，而心之局也則不思有以大之可乎？況欲大此心者，又無風沙腥穢之苦與讐域之辱者乎？」（《本菴集》〔《韓國文集叢刊》a237〕，卷3，頁379a）。以下《韓國文集叢刊》皆引自韓國古典翻譯院：<http://db.itkc.or.kr/>。

³³〔朝〕洪大容，《湛軒書內集》（《韓國文集叢刊》a248），卷3，〈答金內兄氏書〉，頁68a。

的書翰筆墨，皆可能成為跨界的觸媒。在開放的「並世」胸襟下，「元無半面之雅」的東亞文人，皆可聯繫為生存在同心圓中的「百年之石交」。³⁴ 燕巖一派文人在這種「並世」的視野下，不顧北伐反清、尊朱崇明的國是輿論，繼洪大容的乙丙燕行之後循序入燕，並與清人建立起北學之鏈。燕巖一派文人每一個入燕的時間點，如同鎖鏈的扣環，成為《18 世紀韓中文人文藝共和國》詮釋中韓文人結交與談的關結，亦成為《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隱伏的前奏。

六、「因緣」——導航、啟程與續航的動力

「文藝共和國」是由一群具有「並世」意識的文人交織出的想像世界，在每一個人入燕時期他們落實在藝文創作中的交流足跡，彷彿成為下一代燕行的導航座標。作者依循時間座標將他們燕行中的相關故事，與回朝後的趣聞逸事分布在《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的各章節裡，並透過文本的拾遺與補證，謹慎的還原著其中已知與未知的情節。綜觀 40 則故事，以燕巖一派文人的燕行時間點為主軸，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幾個重要時間與人物：一、1765 年，燕巖一派的導航者湛軒洪大容之行：第 1-5 話、第 11、12 話。二、1776 年，燕巖一派的啟航者彈素柳琴之行：第 15-20 話。三、1778 年，燕巖一派的文創者雅亭李德懋與楚亭朴齊家之行：第 21-25 話。四、1780 年，燕巖一派的總長燕巖朴趾源之行：第 26、27 話。五、1790 年與 1801 年，唐魁朴齊家的二度至四度入燕：第 29-36 話。然而，在本書中前後人物入燕時期雖然不同，但因因緣上的前後傳承，讓他們在文化交流史上都呈現著承前啟後的意義。本文就三個別具意義的時間與人物，略述作者在書中欲以呈現的這條因緣之鏈。

首先，1765 年，湛軒洪大容入燕，對燕巖一派可謂具有開啟北學門門的作用。當湛軒自燕京歸國，並將其入清體驗，及其與中原文人的交流故

³⁴ 「元無半面之雅」與「百年之石交」語出李德懋致潘庭筠書信。其背後故事，詳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20話〉，頁358-361。

事，編輯成《乾淨衙筆談》之後。這部不再以讎域看待中國，而是以如實的紀錄精神記載當代的清國盛世，以及文人應接態度的燕行紀錄，一時成為朝鮮文人爭相奉讀的流行讀物。例如，李德懋（1741-1793）閱讀《乾淨衙筆談》之後，自願為湛軒註解，並選其中與嚴誠、陸飛、潘庭筠來往書信編輯成《天涯知己書》；朴齊家則為了閱讀《杭傳尺牘》，再三拜訪湛軒請求賜讀等。洪大容燕行紀錄之盛行，反映了明亡後一百餘年，朝鮮文人欲以破除陳舊的敵對觀念，期待與清代文化接軌的渴望。就燕行錄的轉折意義而言，湛軒的燕行紀錄之所以與早期燕行紀錄的不同，而且對 18 世紀朝鮮文人具有導航性意義，是由於它不再如同紀錄敵情般的報導資料，帶著「義理名分」的有色眼鏡打探清朝的政局與軍情，而是以開闊的視野如實的記載剃髮左衽的漢族舉人如何溫柔敦厚的對待東人；為清盧佔據的腥羶讎域如何包容滿、漢文化創建出文化的盛世。其中對西方傳教士與西方文物的描述，或對保有萬卷書籍之書肆，以及販售「碑版鼎彝古董」、「器玩雜物」之琉璃廠的描寫，³⁵尤其成為燕巖一派極力爭取燕行，向心北學的動機。就此而言，洪大容及其燕行錄的文化意義，一方面在於它促使朝鮮文人打開長期遮蔽在義理名分下的另一隻眼，轉而正視滿清文化的繁榮；另一方面在於洪大容在與清交流史上發揮了締結因緣的角色，為往後燕巖一派文人燕行奠定了文藝與學術交流的基礎。

1776 年，燕巖一派的啟航者彈素柳琴（1741-1788），以副使徐浩修（1736-1799）的幕客身份入燕。在燕京停留期間，柳琴結識了李調元等人，並將入燕前編輯成的「四家詩集」³⁶示予李調元並請李調元品評題跋。李調元最後不只將「四家詩集」命名為《韓客巾衍集》，並同潘庭筠為之作序且加上了評批。³⁷1776 年柳琴入燕之所以與李調元結交，其實除與清人結識之外，亦肩負著購買《古今圖書集成》的使命。因此，就柳琴在中韓文

³⁵ [朝]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韓國文集叢刊》a248），卷9，《燕記》，〈琉璃廠〉，頁294b。

³⁶ 四家，指雅亭李德懋、楚亭朴齊家、冷齋柳得恭（1748-1807）、薑山李書九（1754-1825）。

³⁷ 該評騭本今傳裝潢與保存最精良者為淺見倫太郎舊藏，內附李、潘序跋，與李、潘二人的青批、朱批，現存柏克萊大學東亞細亞圖書館Asami Collection。

化交流上的意義而言，他一方面肩負的是將朝鮮詩文介紹到清代文壇的角色，另一方面擔任的是購買書籍的角色。然而，在清人李調元等人的鼎力協助下，柳琴既完成了將清代第一部鉅帙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傳入朝鮮的任務，³⁸也完成了引介朝鮮詩人踏入中國文壇的使命。自柳琴歸國後不到兩年（1778），《韓客巾衍集》中的兩位詩人李德懋與朴齊家相偕入燕，以評騭《韓客巾衍集》的潘庭筠，以及 1776 年柳琴結識的李調元之弟李鼎元為中心，正式揭開往後清與朝鮮文人之間，互評自編詩集，互題字書詩畫，頻繁來往書信的序幕。³⁹

最後，在 18 世紀「文藝共和國」的整個構圖裡，不能不談的是，具有四度入燕經驗，亦使藤塚鄰專注清朝文化東傳的朝鮮漢學家楚亭朴齊家。1778 年，李德懋與朴齊家自燕京歸朝之後，因正祖（1752-1800）對李、朴二人學問的賞識，及因二人對中國學問的稔熟，不顧他們出身於庶孽的缺陷，特地將二人拔擢為外奎章閣的檢書官。尤其是朴齊家，其對清朝學問與文化的傾慕程度，一可從他被當代人笑稱唐癖、唐學、唐漢或唐魁的名號見出，再者可從他在第二次入燕之前所著之《北學議》中窺見一斑。朴齊家是一位性情直率，又不願拘於小節的人物，第一次燕行回朝之後，時常將他在燕京的所見所聞掛之於口，因口氣過於炫耀，故在當時受到不少文人的覬覦，況且其卑微的身世，更成為世人譏評的箭靶。歸國後雖因誇耀的態度，受到其師燕巖朴趾源的提點，但即便燕巖為楚亭之師，也未能管束住他任性自放的天性。也許正由於這種橫衝直撞及活躍的個性，楚亭

³⁸鄭教授在書中推測徐浩修與柳琴此行，之所以能夠購買5,020冊如此龐大的鉅冊，有可能是借助李調元鼎力相助。見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16話〉，頁287。

³⁹關於李調元與朝鮮文人的交流，以及朝鮮文人詩集《韓客巾衍集》之西傳研究，亦可參見孫衛國，〈朝鮮燕行士人與清朝儒生：以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交往為中心〉，收入楊龍主編，《東北亞社會經濟文化與區域合作》（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頁351-371；〈清乾嘉時期士人之學術交誼——以朝鮮《韓客巾衍集》之西傳清朝及其關涉之士人交流為中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47（2007），頁191-216；李炳珉，〈《韓客巾衍集》與清代文人李調元、潘庭筠的文學批評〉，《外國文學》，2006：6，頁67-72；朴現圭，〈韓國的《四家詩》與清朝李調元的《兩村詩話》〉，《四川師範大學學報》，1998：4，頁87-92；孫德標，〈朝鮮四家詩人與李調元的詩文友誼〉，《社會科學論壇》，2010：10，頁164-167。

才會異於常人的在同一年有兩次入燕的機會，而且從第二、三次燕行起，更擴大且耕深燕巖一派在清朝的交友圈。

1790年，朴齊家在同年二度入燕，⁴⁰是年在燕京所見人士與筆談，由其子朴長醅整理為《縞紵集》。鄭教授在哈佛進行研究時，亦在燕京圖書發現藤塚鄰藏本，為追蹤朴齊家在1790年的燕行足跡，取得相當可貴的資料。無論如何，就朴齊家二度入燕結交清代文人而言，《縞紵集》中就記載了93人之多（頁566）。然而，不只是人數甚至在結交的人士地位上，此次燕行與洪大容入燕，或第一次燕行，都凸顯著明顯的差異。其差異之一是由於第一次燕行朴齊家就與琉璃廠書商陶正祥締結交易書籍之緣，故在結識當代著名的學者時，得到陶正祥居中不少助力。如楚亭與孫星衍的相識就是其中一例。再者，從《縞紵集》中清人名單可知，朴齊家在第二次燕行結交的人士，大多是位居清朝文壇權力核心的人物，如紀曉嵐、翁方綱、阮元、彭元瑞等，多數文人都是在四庫全書館擔任要職，或是與四庫全書纂修官相關的人物。其中在清、朝兩國學術交流史上尤其值得特書一筆的是，朴齊家與四庫全書總纂修官紀曉嵐的因緣。

按《縞紵集》記載，朴齊家最早見到紀曉嵐是在乾隆自熱河回京，御駕抵達圓明園之日（七月三十日）。當天上下百官、內外使臣皆聚集在圓明園準備迎駕，在迎駕典禮上紀曉嵐與侍郎沈初擔任應接各國進賀使節之務，而就在這典禮上朴齊家與柳得恭（1748-1807）始見彬彬有禮、翩翩風度的紀曉嵐。此後，八月初，朴齊家攜自家文集與柳得恭詩集先前往造訪紀曉嵐，但當日因紀曉嵐有客在先，未及與楚亭交談。朴齊家只好先行離去，但在離開之前，留下了一幅輿圖與一件豹皮當作拜訪禮。不過，紀曉嵐因身兼禮官之職，「於法不得取外蕃一物」，故於八月六日書〈而后先生啓〉隨禮送回。⁴¹其後，柳得恭因詢問遼金元明史與《一統志》的編輯狀

⁴⁰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即乾隆八十高壽之歲。朝鮮於五月派遣進賀使節入燕，是年進賀正使為黃仁點，副使則為徐浩修，朴齊家與其同人柳得恭則以正副使的幕客身份入燕。進賀使節於五月二十七日從漢陽出發，經瀋陽，往北直奔熱河先參加乾隆壽宴，於七月二十七日入北京，直到8月離開燕京回朝鮮，九月才預備渡鴨綠江時，正祖傳命令朴齊家再度入燕。

⁴¹「書」見〔朝〕朴長醅，《縞紵集》，卷2（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藤塚鄰舊藏連結

況，及朴、柳二人詩文集之品評事宜，於八月六日之後再訪紀曉嵐。柳得恭此次與紀曉嵐見成，二人筆談尚存於《熱河紀行詩注》。⁴²八月中旬，紀曉嵐則為信守前次書啓與筆談所說「後日之約」，親至玉河館拜訪二人。但當日朴齊家與柳得恭因至琉璃廠，未能親迎紀昀。⁴³不過，此後三人相互造訪，也即形成了彼此筆談以及交流問學的機會。在這則相互拜訪的逸事趣聞裡，值得注意的是，紀曉嵐與楚亭、惠風之所以能夠結下因緣，雖然一方面是基於楚亭與惠風積極向學的熱忱，但另一方面也有賴於紀昀時任禮部尚書，提供了便於使節接觸這位四庫全書的總纂修官之機會，再者，也有賴於紀曉嵐願意信守承諾，樂意授教給東人的氣度。

朴齊家與紀曉嵐的交情，並沒有因楚亭歸朝就此結束，在楚亭回朝之後，紀曉嵐甚至每年寄問安信給楚亭。鄭教授甚至根據《縞紵集》中朴長醺追記推測，朴齊家的第四次燕行（1801），很可能還是由於紀曉嵐寄給楚亭的一首〈寄襄而后先生〉而促成。⁴⁴總而言之，這位被正祖喻為「華國之才」的朴齊家在文化層面的建樹，一則在第一次（1778）燕行，為將來的燕行使節打通購書與互換學術資訊的管道，第二、三次（1790）燕行則結交清

檔案，網址：[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9743933\\$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9743933$1i)）。

⁴²按詩注：筆談間，紀昀暢談《四庫全書》收編朝鮮儒學家徐敬德《花潭集》與閱讀此前奉送二人詩集之感。事見《熱河紀行詩注》，轉引自鄭珉，《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頁556。

⁴³事見〔朝〕柳得恭，《冷齋集》（《韓國文集叢刊》a260），卷4，《熱河紀行詩》，〈紀曉嵐大宗伯〉，頁076a。

⁴⁴〈寄襄而后先生〉全詩如下：「偶然相見既相親，別後匆匆又幾春。倒屣常迎天下士，吟詩最憶海東人。關海兩地無書札，名姓頻年問使臣。可有先編裏我未，老夫雙鬢漸如銀。」該詩收錄於哈佛圖書館藤塚鄰舊藏〔朝〕朴長醺，《縞紵集》。鄭珉教授又按詩下朴齊家之子朴長醺追記以為，紀曉嵐將該詩交給回朝使節，託付回朝使節先傳給正祖過目。此舉乃是間接懇請正祖派遣朴齊家再度入燕。正祖則見過此詩後，不只心領紀曉嵐來書之意，還在眾臣面前讚稱朴齊家為「華國之才」。《縞紵集》中朴長醺追記全文如下：「尚書做此詩，出給先公之意書，請於我先大王，上即命公入侍，面賜此詩，天顏和霽，故諭侍臣曰：『以此觀之，朴齊家非華國之才歟？』蓋異數也。而論者反以為咎云，寧不慨然，飲泣者乎？」鄭珉教授之說，詳見《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第32話〉，頁551-567。紀曉嵐〈寄襄而后先生〉與朴長醺追記，見〔朝〕朴長醺，《縞紵集》，卷2（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藤塚鄰舊藏連結檔案，網址：[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9743933\\$1i](https://iiif.lib.harvard.edu/manifests/view/drs:9743933$1i)）。

代學術最核心的考據學者，為 19 世紀清代考據學的東傳開啟了另一扇學術交流的窗口。⁴⁵

在 18 世紀中韓文人的文藝交流史上，如果說洪大容扮演的是開啟封閉的門門，並為 18 世紀文人奠定交流礎石的導航者角色，那麼，柳琴、李德懋與朴齊家，則是透過實際的藝文創作為往後的中韓文人拉開文藝交流序幕的領航者。其中朴齊家更因為四次的入燕經驗，以及在每一次入燕擴大的人際網絡，不啻稱為 18 世紀中韓文人交流史上的續航者。清與朝鮮的古物，個人的文集，繪畫、字書與魚雁，就在這些文人建立的關係網絡中穿梭往來。在這個網絡裡，每一個機緣彷彿同心圓的一個立足點，每一次會晤又似同心圓向外劃開的圈，一個邂逅招喚著另一個邂逅，一段友情招引著另一段友情，同心圓就此逐漸向外擴散，逐漸放大漣漪。18 世紀中韓文人在交流史上，以漢文為共通的語言開啟的文藝交流契機，雖然在朴齊家最後一次入燕（1801）之後，逐漸闔上接應的窗口，但朴齊家遺留給後世的因緣，卻又為後人開啟了另一道考據學東傳之門，而這樣的因緣一直延續到 19 世紀後半才暫告落幕（頁 361）。

七、「差異」與「意義」——問題討論

《18 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可以說是一部透過舊藏的發掘編織成的一幅人文地圖，而每一件未曾被藤塚鄰充分照明的物件，是作者著力敘述的關鍵。但如何讓孤零的書籍、筆帖、字畫說出它的意義？又如何能夠讓它在文藝共和國中體現文化的厚度？筆者認為，若對新文獻的歷史背景沒有足夠的理解，那麼，文獻即便是新出土的也不過只是被當作「物質」來看待。若不對同一文獻不同版本經過細緻的比對，那麼，文獻也不過只會呈現為單調的素描。換言之，新資料必須要被編織進原先的脈絡才能彰顯出它靈動的聲響，同一書題不同版本的文獻資料，需要經過逐字的

⁴⁵19世紀朝鮮考據學集大成者秋史金正喜，早年從學於朴齊家。1805年入燕時，即以朴齊家於第二、三次（1790）與第四次（1801）結交的阮元為中心，擴展出他與清人的交流網絡。

比對才能發現隱藏在字裡行間的複調。誠如作者所說「意義源自於差異」（頁275），藉著差異的考掘與脈絡的重編，文本縫隙之間繁複的意義才會被彰顯出來。就此而言，本書在差異與意義的考掘與補充上達到了一定的目標。

如《鐵橋全集》是作者到哈佛燕京研究院最先發現的藤塚鄰舊藏。藤塚鄰在京城大學期間蒐集此書，將它謄寫在他的專用稿紙「望漢廬」稿箋上，並以自己的方式為它裝潢，製作封面，貼上標籤，題上書名。也同時收集了與此書相關的朱文藻與嚴昂書信。相關資料雖已收齊，但未待藤塚鄰為它們說出背後的故事，就被拆解到異地。原先應該共存於藤塚鄰書房的《鐵橋全集》與書信，前者現今為燕京圖書館收藏，書信則只留下照影保存在果川秋史博物館。然而，這些文物若未經作者精巧的排列、細緻的比對，則可能只會為後人記憶為某個圖書館的館藏，或某個博物館的收藏單品。不過，在長達一年多截稿的時間壓力下，經作者耐心的詮釋，以及舊藏斷片的脈絡化，於是讓《鐵橋全集》之所以流入朝鮮的來龍去脈，以及嚴誠臨終前懷念洪大容的光景，浮現在這部18世紀的人文地圖裡。

本文所舉《鐵橋全集》也不過是《18世紀韓中文人的文藝共和國》中一個開端的例子，其實在該書中的每一則交流史話裡，皆包含著新出土且具體的文藝創作品（如尺牘、筆帖、繪畫、畫冊等）。而且書中引用的新物件不僅限於燕京圖書館的藤塚鄰舊藏，還包括由韓國各大博物館，或私人收藏家近來公布於世的稀有本文選集與孤本字畫書帖集等資訊。相對於近來《燕行錄》研究著眼於文獻進行的分析來說，書中提供的具體文藝作品，不外為中韓文人的交流研究提供了更具實證性的歷史材料，此點正是鄭珉教授的研究備受矚目的貢獻。再者，作者引用具體的文件來佐證史實的方法，以及將每一個斷片放回歷史的脈絡，重編、細讀其著作時間與背景的書寫方式，也為19世紀以前清學傳入朝鮮的聯通網路提供了比較清晰的脈絡。然而，關於朝鮮的四家詩人與清代文人之間的友誼關係，與四家詩人的詩集《韓客巾衍集》的西傳與西傳之後形成的批評，⁴⁶以及四家之一李德

⁴⁶請參見註38。

懋的《清脾錄》與李調元《續函海》所收《清脾錄》之版本差異與閱讀視角的不同，⁴⁷雖然早於鄭珉教授就有多位學者進行過相關論述，但鄭珉教授與既往研究之不同，在於他將四家詩人放在 18 世紀朝鮮漢文學由明轉向清的脈絡裡，縱向的探查四家詩人所屬之群體（燕巖一派）在東亞漢學演變中扮演的角色，並透過個別文集之異本的比對，呈現出 18 世紀朝鮮文人接受清學的同時，在國內承受的輿論壓力，以及不得不經過「自我檢驗」編輯個人文集的學術環境。此點也為我們了解 18 世紀朝鮮文人的現實處境提供了另一種「在地」的視角。

最後，在論本書的價值與優點之餘，不免也應點出本書引用文獻上的問題。首先，在第 16 話「『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一節，作者指出以武英殿聚珍銅活字印刷的一萬卷 5,020 冊《古今圖書集成》，引入朝鮮之後轟動一時。並引燕京圖書館藏《武英殿聚珍版書》（每函十冊，共 502 函）云：「沒想到每天無意的經過這 502 函的書籍，竟然是如此著名的《古今圖書集成》。」

按筆者查作者書中所附《武英殿聚珍書》插圖，認為該書應非《古今圖書集成》，原因如下：一、〈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有序〉應是乾隆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所著御製序，而非雍正為《古今圖書集成》所著御製序。二、按插圖中乾隆序，《武英殿聚珍書》應為乾隆三十九年（1774）起自《永樂大典》輯出之《四庫全書》之珍本秘籍，即應是《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而非《古今圖書集成》。三、若確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則《武英殿聚珍版叢書》與《古今圖書集成》的印刷技術不盡相同，即前後二書雖然以聚珍字為共同字型，但前者是以乾隆三十九年金簡所製木活字印製而成，後者則是以聚珍銅字排版印刷成書。職是，筆者認為《武英殿聚珍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應非同一部叢書，故引用書籍圖錄有待商榷。

其次，第 25 話「五柳居書店主人陶生」一節，引李德懋〈入燕記〉指出，李德懋與朴齊家於五月二十五日先至五柳居，看過五柳居將從江南運

⁴⁷請參見註24。

至北京的書目與《浙江書目》之後，對當時浙江地區的出版狀況深表驚嘆。五月二十八日二人又至五柳居參觀從江南運到的書籍，並為書狀館購買所託書籍。六月二日則瀏覽了 60 套《皇清經解》。

筆者按，六月二日李德懋與朴齊家在五柳居所覽經解應非《皇清經解》，原因如下：一、《皇清經解》又名《學海堂經解》為兩廣總督阮元所輯，於道光九年（1829）完成輯刻，故李德懋入燕時（1778）該書尚未出版。二、再按李德懋《入燕記》原文云，經解者，應為朱彝尊與徐乾學，⁴⁸故該套書應與朱彝尊有關。三、按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指出，李德懋在《入燕記》中誤將《通志堂經解》編纂者記為朱彝尊，這可能是因為書中所錄朱彝尊〈經解序略〉造成的筆誤，而《通志堂經解》實際上應為納蘭成德輯編。⁴⁹故按上述輯刻完畢時間，以及李德懋與藤塚鄰記述，此「經解」應為《通志堂經解》而非《皇清經解》甚明。以上兩點為本書白璧之微瑕，備此一記，以免讀者誤引。

本文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收稿；2017 年 6 月 4 日通過刊登
責任校對：吳政龍

⁴⁸〔朝〕李德懋〈入燕記〉（下）「正祖二年六月初二日」云：「往五柳居陶生書坊，檢閱經解六十套。經解者，朱竹垞彝尊、與徐憺圃乾學。搜憺圃，竹垞所藏。又借秀水曹秋岳，無錫秦對岩，常熟錢遵王，毛斧季，溫陵黃俞邵之藏。得一百四十種。」（《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a259〕，頁225c）。

⁴⁹藤塚鄰，《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總說〉，「第五章李雅亭、朴楚亭の入燕と通經堂經解の將來」，頁30。